

中国经济从起飞走向成熟: 彰显以人为本

◎主持人: 邹民生 乐嘉春

■嘉宾



方欣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以人的全面发展来谋划中国的未来

主持人: 党的十七召开了。这将是一次关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历史性重要会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人们自然要回首过去, 同时要对未来趋势有所展望。你多年从事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 也有不少心得吧?

方欣喜: 近几年, 不光是我们自己,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和基本脉络。改革开放已经搞了近30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谋划整个改革发展的新篇章、大布局, 相当重要。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 大家比较关注诸如经济是否过热、房地产价格调控、资本市场走势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来说, 不能把目光总是盯在短期的、局部的事情上。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 我们从自身的基本国情出发, 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方略, 又能够长期坚持, 这是过去30年虽有小的或局部的问题, 但总体上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如果放眼整个历史, 可以说, 我国正处于150多年来发展的最好时期。下一步怎么办? 需要我们在历史

进程中把握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以及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性, 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其中, 确立什么样的发展价值, 尤为关注。

我国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就是要将人的主体性作为发展的首要价值。确立这样的理念, 其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思路。由此, 必将引发我国新阶段改革开放出现新的大格局。

这里, 在评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有一个重要观察点是, 我国已经基本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

正在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而在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仍然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

当然, 新阶段的改革开放, 与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 也要有新的发展, 这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发展观, 就是改革要逐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 使大多数人能够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 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

我国已走过经济起飞阶段, 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

主持人: 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也就是我国已经基本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 正在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具体怎么看呢?

方欣喜: 当前, 大家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么这个新阶段到底怎么来断定呢? 我认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比较贴近我国的现实。

罗斯托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多个经济成长阶段:

一是传统社会, 其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 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 农业居于首要地位, 消费水平很低, 存在等级制, 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

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 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 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

三是起飞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解释, 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实现起飞需要3个条件: 一是较高的积累率, 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 二是要有起飞的主导部门; 三是建立能保证起飞的制度。

四是成熟阶段。这是起飞阶段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增长时期。其特点是, 现代技术已被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 工业将朝着多样化发展, 新的主导部门逐渐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

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

按照罗斯托的分析框架, 我国建国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所谓的传统社会阶段;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 可以

看作是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 改革开放至今的近30年, 恰好符合经济起飞阶段的基本特征。

在过去的30多年中, 我们保持了10%以上的积累率, 工业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 也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彻底地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1978年到2006年之间, 我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7%, 由3645.2亿元增加到209406.8亿元, 2006年是1978年的57.5倍。人均GDP从2000年的7858元增加到2006年15973元, 达到了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

在1978年到2006年之间, 我国GDP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 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45%, 由1132.26亿元增加到38730.62亿元, 2006年是1978年的34.2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

长17.21%, 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17606.9亿美元, 2006年是1978年的85.3倍; 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4%, 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0663亿美元, 2006年是1978年的6385倍。

那么,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很高, 投资率仍居高不下, 仍具有起飞阶段的一些特征, 凭什么说起飞阶段完成了呢? 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了。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我国的经济增长达到11%, 恐怕仍不成问题。但是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民间, 都明显地觉察到了现在这种高速增长背后潜在的风险。比如说, 资源环境的挑战, 尤其是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高速增长得不偿失, 按照“十一五”规划要求, 节能降耗达标任务艰巨。对于这种超出国力的增长, 速度高已不再

是好事了。

为了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和和谐社会等新理念。在这一系列新理念当中, 把过去的“又快又好”变成“又好又快”, 不再一味求快。这便是在发展理念上走向成熟的反映。

最近两年, 有许多提法, 从“中国崛起”到“和平崛起”, 再到“和平发展”等等, 非常引人注目。我认为这一系列词汇的演进, 是从一个高度热情到高度理性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逐渐开始形成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心态和大国理念。

这些从经济生活到社会观念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 都是我国从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进入成熟阶段, 要在国家战略上关照人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 那么, 走向成熟的中国经济社会, 在发展理念上会有哪些升华? 尤其是在价值观上会有哪些调整?

方欣喜: 在我国, 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4年了, 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 就是要恢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应当说, 这是顺应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客观规律而做出的国家层面的战略安排。

在经济起飞阶段, 经济总量的增长非常重要, 没有超常的增长很难叫做起飞。无论是过去的英国、德国、美国、日本, 在经济起飞阶段, 无不是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在经济起飞阶段, 个人对于经济发展, 更多地是作为工具性而存在。大家都

致力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较少地消费, 这本身也是起飞的基本条件。

但是到了成熟阶段, 各国都面临着发展战略的转型。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就是人的主体地位如何确立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成为一个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票。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我们面临如下两大任务。

第一, 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生产能力空前扩张之后, 大家仍不消费怎么办? 比如, 2000至2005年, 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5.3%、36.5%、37.9%、41.0%、43.2%和42.6%。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2000至2002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5%、21.4%和19.9%,

在2002年底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 中等收入国家为25%, 高收入国家为22%。而我们的消费率却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是61.4%下降到2004年的54.3%, 进一步下降到2006年的50%。

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能仅仅扮演劳动力的角色。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坚持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优势, 农民工工资上涨会削弱我国的竞争力。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算大,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是好事等, 放在经济起飞阶段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来临, 这些观念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再固守这些观念, 就会产生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异化问题。

第二, 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起飞阶段之后, 能够转变为发达国家的, 几乎都是通过人力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替代,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兼顾。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当不足, 比如, 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 水资源、石油、铁矿石、铜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8%、45%和26%。从1978年到2004年,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 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贡献为68%, 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32%, 而且近几年还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源环境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但从本质上说, 资源环境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 都是因为人的发展, 而不是自然资源的增多造成的。如果人本身的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 资源环境问题就很难成为发展的瓶颈。

20世纪众多的发展理念中, 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成为主流, 绝不是偶然现象。他认为, 发展就是人们可行能力(实质自由)的扩展。在这一理念下, 发展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过他们自己想过的有价值的生活, 但其前提是每个人都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阿马蒂亚·森比较好地处理了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之间的关系, 恢复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 也包含着鲜明的政策含义, 就是要国家在战略层面、政策层面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关照。

深化改革开放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

◎方欣喜

按照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来推进改革, 就是要通过系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使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转化为人口素质的提升, 使人口素质的提升又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循环。

那么, 具体从何处着手呢? 我认为, 应当先从建构公共服务体制开始。因为, 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这两种公共服务对人的全面发展最为重要。国际经验表明, 公共教育体制和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是促使经济增长转化为人口素质提升的关键所在。所以, 应当先行解决。

目前, 我国财政每年增长差不多接近1万亿, 但这两项公共服务大致是千亿美元以内的花费, 何况我们还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许多人指出, 这些钱用来做什么更好呢? 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

我国的经济一直有投资过热的倾向, 投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利润也相当微薄。从总体上看, 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超前于发展中国家, 在许多方面比某些发达国家也差不了多少。这种情况恰恰意味着我们在此方面改

革的时机已非常成熟了。

第一, 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 我们可以解决相当大一部分民生问题。解决相当大一部分因教育致贫、因病致贫的现象。

第二, 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 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物质成果转化为人力资本, 从而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

第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 实现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有学者提到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就简单地按照西方理论认为, 主要是加强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推进民间组织的发展远不如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改革收益大, 而且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阻力也比发展民间组织小。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可以以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为目标, 来发展民间组织, 调动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的改革方案会更为稳妥, 更容易出成效。

进一步说, 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 有利于建立一种政

府“兜底”的机制, 也能够为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提供重要支撑。如果政府不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 市场经济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坏的市场经济。

把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对外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新的发展方式要求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建立一种体制机制, 使经济发展不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此方面, 我们要高度重视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从国际经验看, 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是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际情况看, 需要抓紧推进资源要素领域的改革, 使资源环境成本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出来, 政府也应当征收资源税。这样, 就会使企业主动地减少资源消耗, 也会催生可替代能源的技术创新。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 我国将需要利用世界石油矿产资源来发展自己。为此, 应当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推进对外开放。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 因此, 消极的对外开放对经济更不安全。发达国家对国际石油的重视,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大国, 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大国,

离开世界资源很难实现长足发展。

新的发展方式要求公平的发展。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 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起点公平。但我们仍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过程的公平。现在人们往往希望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来规范收入分配, 事实上, 由于垄断的存在, 产权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初次分配不公、不透明的现象更为突出, 这些问题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得到解决。

我们还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使文化事业成为与大国相对应的软实力。当我们的发展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时候, 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们应当牢记自己是世界公民。要真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应当具有世界范围内广泛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这样, 我们才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尊重, 为我们的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从上述分析看, 我们现阶段的改革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创新, 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阶段改革的重要性、深刻性、复杂性, 丝毫不亚于过去30年的市场化改革。

从新阶段改革的规律看, 这些改革更多地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 将使得政府改

革成为新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但从政府自身改革来看, 要涉及到干部体制的变动, 比如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 要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比如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分工问题, 要涉及到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将触及现行的政治体制, 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得到解决。以什么标准来检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能够建立起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就基本完成了。

有人提出, 新阶段的改革能否尝试一下激进式的改革方案? 从全局来说, 我们并不具备这个条件。通过这些年来对转轨国家的观察, 打破国家秩序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重建社会秩序往往会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在确保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 反而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比如, 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在短短几年就免除了农业税, 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 这就是局部的激进式改革, 具有明显的改革收益, 又没有改革风险。事实上, 在政治体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做的、利国利民的事情。

■看点

●在我国, 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4年了, 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 就是要恢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应当说, 这是顺应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客观规律而做出的国家层面的战略安排。

●目前, 我国已经基本上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 正在开始向成熟阶段过渡。新阶段的改革开放, 与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 也要有新的发展, 这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的改革发展观, 就是改革要逐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 使大多数人能够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 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

●为了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和和谐社会等新理念。在这一系列新理念当中, 把过去的“又快又好”变成“又好又快”, 不再一味求快。这便是在发展理念上走向成熟的反映。

●经济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各国都面临着发展战略的转型, 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就是人的主体地位如何确立的问题。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我们面临如下两大任务。第一, 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第二, 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

●按照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来推进改革, 就是要通过系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 使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转化为人口素质的提升, 使人口素质的提升又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循环。应当先行解决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这两种公共服务体制; 把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对外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新的发展方式要求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建立一种体制机制, 使经济发展不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我们还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使文化事业成为与大国相对应的软实力。我们现阶段改革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创新, 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阶段改革的重要性、深刻性、复杂性, 丝毫不亚于过去30年的市场化改革。

■编余

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30年丰硕成果之际, 党的十七召开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人们回首过去, 也对未来抱有十分美好的憧憬。因此, 对这次会议格外期待。今天, 我们特邀方欣喜博士, 就大家关心的中国发展问题进行对话。

方博士认为, 目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而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就是要将人的主体性作为发展的首要价值。确立这样的理念, 其意义十分重大, 并将引发我国新阶段改革开放出现新的大格局。

他还表示, 我国已经基本走过了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 正开始走向成熟。从“中国崛起”到“和平崛起”, 再到“和平发展”, 这一系列理念的演进, 是一个从高度热情到高度理性的转换过程。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 表明我国已开始向新的发展阶段迈进。

在历史新起点上,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这是顺应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客观规律而做出的历史抉择。这一战略思想确立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是在战略层面、政策层面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照。意味深长。

——亚夫